

元和十四年朝廷大事件对白居易忠州诗的影响

陈 忻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三月二十八日白居易到达忠州任刺史,在任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诗歌,其主要特点一是记写政事的作品平和简淡,二是以个人生活为主题的作品普遍渗透着乐少愁多的诗情。这种情状的出现除个人仕途际遇的原因之外,也与朝廷发生的大事件有很大关系。正是朝廷的大事件与白居易自身的仕宦遭遇共同作用,塑造了白居易忠州时期的诗歌表达形式及情感方向。

关键词:元和十四年;朝廷大事件;白居易;忠州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0)05-0040-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00504

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二十日,白居易奉敕量移忠州刺史,结束了四年的江州司马生活。元和十四年(819)三月二十八日白居易到达忠州,元和十五年(820)四月被召还京,在忠州的时间共计一年余。白居易曾在《江州司马厅记》中记叙其司马之职云:“司马之事尽去,唯员与俸在。”“无言责,无事忧。”“进不课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1]2732}与之相比,刺史的职责不再是“吏隐”的状况,而是要肩负具体而重要的职责:“掌清肃邦畿,考核官吏,宣布德化,抚和齐人,劝课农桑,敦敷五教。每岁一巡属县,观风俗,问百年,录囚徒,恤鳏寡,阅丁口,务知百姓之疾苦。部内有笃学异能闻于乡闾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悌,悖礼乱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绳之。其吏在官公廉正己,清直守节者,必谨而察之。其贪秽谄谀,求名徇私者,亦谨而察之。皆附于考课,以为褒贬。若善恶殊尤者,随即奏闻。若狱讼疑议,兵甲兴造便宜,符瑞尤异,亦以上闻。其常则申于尚书省而已。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精诚感通,志行闻于乡闾者,亦具以申奏,表其门闾。其孝悌力田,颇有词学者,率与计偕。其所部有须改更,得以便宜从事。”^{[2]1919}在忠州,白居易在守官之余,写下了大量的诗歌,从总体上看,其特点一是记写政事的作品平和简淡,二是以个人生活为主题的作品普遍渗透着乐少愁多的诗情。这种情状的出现除个人仕途际遇的原因之外,也与朝廷发生的大事件有很大关系。

一、记写政事诗的平和简淡

白居易由江州到达忠州后的当日便作有《忠州刺史谢上表》,其中说自己对于新的任职“喜极魂惊,感深泣下。方今淮蔡底定,两河义宁。臣得为昇平之人,遭遇已极;况居符竹之寄,荣幸实多。誓当负刺慎身,履冰厉节。下安凋瘵,上副忧勤。未死之间,期展微效”^{[1]3423}。文中既有感恩朝廷之情,也表达了

收稿日期:2020-03-06

作者简介:陈忻(1963—),女,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忠于职守、有所作为的希冀。翻阅白居易忠州时期的诗歌作品,正面表现官场公事、评论时政的作品很少,与之相关的作品大约只有《征秋税毕题郡南亭》《早祭风伯因怀李十一舍人》《郡中春宴因赠诸客》《东坡种花》《代州民问》《答州民》几首。这些诗有的是记录丰登之喜,如《征秋税毕题郡南亭》:

高城直下视,蠢蠢见巴蛮。安可施政教,尚不通语言。且喜赋敛毕,幸闻闾井安。岂伊循良化,赖此丰登年。案牍既简少,池馆亦清闲。秋雨檐果落,夕钟林鸟远。南亭日潇洒,偃卧恣疏顽。

作为一州刺史,白居易既为“赋敛毕”“闾井安”而喜,也因“案牍既简少,池馆亦清闲”而感到轻松。但“安可施政教,尚不通语言”的诗句,也将他虽任刺史,却不得不面对当时忠州荒僻生疏之境的不适尴尬表露无遗。他如《早祭风伯因怀李十一舍人》简单记写在忠州“导骑与从吏,引我出东垆”的“夙兴祭风伯”活动后,突然跳转到当年供职朝廷的情状:“忽忆早朝日,与君趋紫庭。”“至今想在耳,玉音尚玲玲”,这种短距离内的大幅跳转因其对昔日细腻深情的思念而形成今昔的落差,则作者对今日任职忠州的感受尽在不言之中。《郡中春宴因赠诸客》是记写“是时岁二月,玉历布春分。颁条示皇泽,命宴及良辰”的活动,诗中描绘了当日官民共乐的情景:“冉冉趋府吏,蚩蚩聚州民。”“薰草席铺座,藤枝酒注樽。中庭无平地,高下随所陈。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使君居上头,掩口语众宾”,全诗最后说:“勿笑风俗陋,勿欺官府贫。蜂巢与蚁穴,随分有君臣”,表现了白居易作为刺史与民同乐的初心本意。《东坡种花》共两首,其二是借种花的过程论说省事宽刑以养民的道理:“养树既如此,养民亦何殊?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移此为郡政,庶几甦俗苏。”《代州民问》和《答州民》二诗是记写白居易在忠州“龙昌寺底开山路,巴子台前种柳林”的实绩。以上这些与忠州刺史的政事相关的诗歌一般都篇幅不长,记事和抒怀也非常简单,很难通过它们对白居易执政期间所关切的事件和对象作出评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应当与白居易之前被贬江州的经历及宪宗晚年朝廷上所发生的政治大事件有关。白居易自贬谪江州以来,对自己的从政经历进行了反省,其主要情绪是忧郁悲楚的。同时,元和十三年底发生在朝廷上的任用柳泌和重贬韩愈的事件显示出宪宗晚年企慕长生、难于纳谏的情绪和态度,这两个重要事件所造成的“群臣莫敢言”^{[3]7755}的结局对于刚刚奉敕量移的白居易定会产生影响。

白居易对自己从政经历的反省屡屡出现在贬谪江州司马以来的诗文中。这里为方便分析其忠州政事诗平和简要的相关因素,仅以元和十四年初白居易前往忠州赴任途中所做《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的长诗为例加以探讨。诗中后半部分集中回顾了自己早年不知“随时”,但求“报国”,奋笔疾书却终遭贬谪的结局,他在反省中期望“但在前非悟,期无后患婴”,他为此找到的途径就是“无妨隐朝市,不必谢寰瀛”,他决定要知足知止,避免“多知”的“险路”,他要“昏昏随世俗”“犹足保余生”:

早接文场战,曾争翰苑盟。掉头称俊造,翘足取公卿。且昧随时义,徒输报国诚。众排恩易失,偏压势先倾。虎尾忧危切,鸿毛性命轻。烛蛾谁救护?蚕茧自缠萦。敛手辞双阙,回眸望两京。长沙抛贾谊,漳浦卧刘桢。鸚鵡鸣还歇,蟾蜍破又盈。年光同激箭,乡思极摇旌。潦倒亲知笑,衰羸旧识惊。乌头因感白,鱼尾为劳赅。剑学将何用?丹烧竟不成。孤舟萍一叶,双鬓雪千茎……险路应须避,迷途莫共争。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经营?玉向泥中洁,松经雪后贞。无妨隐朝市,不必谢寰瀛。但在前非悟,期无后患婴。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晦即全身药,明为伐性兵。昏昏随世俗,蠢蠢学黎氓。乌以能言繆,龟缘入梦烹。知之一何晚,犹足保余生。

江州四年带给白居易太多的失落忧郁,这在其江州时期的诗文作品中有大量表露。当他终于离开

了江州,在去往忠州的路上,他就开始反省当初“众排恩易失,偏压势先倾”的痛苦经历,得出了“但在前非悟,期无后患婴。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晦即全身药,明为伐性兵”的结论。既然“多知”“能言”的“明”乃是“前非”,他自然要在刚刚得到的忠州刺史的新任上调整做官处事的方向,即在保持自己“洁”与“贞”的前提下,尽可能避免因“多知”“能言”的“争”而再次坠入“险路”“后患”的可能性,他所说的“无妨隐朝市”的处事方式,其内涵当然是“知止足”“少语”。为避免早期的因“昧随时义”而致身危切的遭遇,他期望取“晦”之一途,“昏昏随世俗,蠢蠢学黎甿”,以便能够在未来的宦途上“犹足保余生”。这样的心思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白居易忠州期间的诗文较少涉及时政及滔滔评论言说的特点。

翻阅忠州时期白居易的诗文作品,正如上述,其早年议论批判的锋芒确实大大地减弱了,与之相对,平和达观的语言呈现着委顺任运的风貌。诸如“自兹唯委命,名利心双息。近日转安闲,乡园亦休忆。回看世间苦,苦在求不得。我今无所求,庶离忧悲域。”^{[1] 612}遣怀“外貌虽寂寞,中怀颇冲融。赋命有厚薄,委心任穷通。通当为大鹏,举翅摩苍穹。穷则为鹪鹩,一枝足自容。”^{[1] 597}我身“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1] 614}负冬日等等皆可作为白居易忠州时期“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经营”的具体诠释,这也是他因“知止足”而藉以“保余生”的一种方式。

再来看白居易量移忠州之际朝廷上发生的两桩大事件。

第一桩事件是任用柳泌求长生药。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记载:“上(宪宗)晚节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为鄂岳观察使,以贪暴闻,恐终获罪,思所以自媚于上,乃因皇甫镈荐山人柳泌,云能合长生药。甲戌,诏泌居兴唐观炼药。”^{[3] 7754}柳泌不安于仅仅合药,更要求官,元和十三年(818)十一月,“柳泌言于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灵草,臣虽知之,力不能致,诚得为彼长吏,庶几可求。’上信之。丁亥,以泌权知台州刺史,仍赐服金紫。谏官争论奏,以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临民赋政者。’上曰:‘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臣子亦何爱焉!’由是群臣莫敢言”^{[3] 7754-7755}。宪宗明言为求长生不吝官职,直接堵住了谏官的嘴。柳泌采仙药无果,宪宗不治其罪,反加保护。“柳泌至台州,驱吏民采药,岁余,无所得而惧,举家逃入山中;浙东观察使捕送京师。皇甫镈、李道古保护之,上复使待诏翰林;服其药,日加躁渴”^{[3] 7775}。在这种情况下,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起居舍人裴潏上言辩其伪,却因此被贬:

起居舍人裴潏上言,以为:“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乐者殄天下之福,自黄帝至于文、武,享国寿考,皆用此道也。自去岁以来,所在多荐方士,转相汲引,其数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潜岩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权贵之门,以大言自衒奇技惊众者,皆不轨徇利之人,岂可信其说而饵其药邪!夫药以愈疾,非朝夕常饵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气,殆非人五藏之所能胜也。古者君饮药,臣先尝之,乞令献药者先自饵一年,则真伪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贬潏江陵令。^{[3] 7775}

宪宗拒绝劝谏,一意求长生,其结果却是惨痛收场。元和十五年(820)正月,“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3] 7777}。在柳泌事件中,宪宗的执迷是群臣无力改变的,而“群臣莫敢言”“上怒”这些字样本身也彰显了宪宗晚年君臣关系的紧张。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刚刚获得量移的白居易一是要克服在忠州“安可施政教,尚不通语言”的困难,了解熟悉州情并处理忠州的政务;二是在远离朝廷、远离政治漩涡的忠州荒僻之地,且刚刚经历过因言罹祸的凶险,白居易似乎也没有可能和必要投入到对朝廷政事的评点批评中。

第二桩事件是韩愈因谏佛骨被贬潮州。元和十三年(818)十一月,“功德使上言:‘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帅僧众迎

之”^{[3]7756}。元和十四年(819)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3]7758}。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4]616}论佛骨表的情况下,韩愈愤而上《论佛骨表》,斥兹事“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其文言辞激烈,因古鉴今,锋芒犀利: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4]613-614}论佛骨表

与宪宗迎佛骨以求“岁丰人安”争锋相对,韩愈直指“事佛渐谨,年代尤促”“事佛求福,乃更得祸”。这犀利肆意的言辞立即受到严厉而迅速的处置,据《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记载:

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裴度、崔群奏曰:“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罪,然而非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伏乞稍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惊惋,乃至国戚诸贵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刺史。^{[2]4200}

韩愈列举前朝奉佛却身死国灭的事实,其“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的言辞深深刺痛了正沉迷长生的宪宗,就在上表的同一月,便被贬谪潮州刺史,“即日奔驰上道,经涉岭海,水陆万里”^{[4]618}潮州刺史谢上表,正如《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所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三月二十五日,韩愈到达潮州上任,其《潮州刺史谢上表》说:“臣以狂妄戇愚,不识礼度,上表陈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万死犹轻。”“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4]617-620}这种遭遇与情感是元和十年被谪江州司马的白居易所熟知的。白居易得到量移忠州之命是在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二十日,他是在元和十四年(819)三月二十八日到达忠州的。从时间节点上看,韩愈谏佛骨及遭贬正好发生在白居易量移之际。四年的江州贬谪生活本已让白居易饱尝了宦海风云的险恶,这一次发生的重谪韩愈的事件更在他新任之际给予了再一次的警示。虽然在现存白居易的诗中看不到对于此次韩愈事件的评论,但考虑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复杂敏感,其影响应该是在士大夫心中深刻存在的。

以上两桩事件都发生在白居易量移忠州期间,裴潏和韩愈上疏进谏而遭重谪的事实很容易让他联想到元和十年(815)七月自己因宰相武元衡被刺杀而上疏引发的江州之贬的遭遇:“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诋毁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2]4344-4345}四年江州司马的生活带给他太多的失意伤悲,在终于能够量移忠州刺史之时,他既然已经生出了“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晦即全身药,明为伐性兵”的念头,也就不可能在反映政事的作品中大肆议论朝政或表达激烈的情绪。可以说,这样的心境也是白居易此期记写政事诗平和简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乐少愁多的诗情

从白居易一年余的忠州诗歌创作的总体情况来看,可以说是乐少愁多。日本学者芳村弘道对白居易这一时期的诗歌倾向进行了分析:“由于被任命到僻远之地的心理感受,白居易在忠州时也跟任江州时一样,常常吟咏对京师和朝廷的思慕。但是另一方面,在江州吟咏的诗中存在依靠‘知足保和’,镇定

这种思绪的作品,而在忠州却未吟咏过这类作品。这个事实表明,忠州缺乏给白居易带来安慰并邀他进入闲适境界的条件。进而可以认为,闲适条件的缺乏,构成了即使具有与江州时期同样的穷境意识也无法多多创作‘闲适诗’的主要原因。”^{[5]203}“忠州缺乏如江州那样的进入闲适境界的条件,所以‘闲适诗’的创作不多。在《白氏长庆集》五十卷中,忠州时期的诗作有一二一首。其中古体诗共四一首,全部收在卷十一的‘感伤三’中。剩下的是‘律诗’(近体诗)八〇首。而忠州的‘闲适’类诗一首都没有。”^{[5]207}他统计发现白居易忠州时期所写的数量有限的具有“闲适”倾向的诗歌主要集中在元和十五年(820),这一年夏天,白居易就已经离开忠州赴京任司门员外郎了。元和十四年(819)在忠州刺史的任上,白居易诗文中涌动的主要情绪是远离故乡、知己难觅的孤独感,如“故园音信断,远郡亲宾绝”^{[1]593}花下对酒,“老去争由我?愁来欲泥谁?空销闲岁月,不见旧亲知”^{[1]1163}新秋。他既哭故交的逝去:“昨日哭寝门,今日哭寝门。借问所哭谁,无非故交亲”,^{[1]603}哭诸故人因寄元八又叹新知的难觅:“峡内岂无人?所逢非所思。门前亦有客,相对不相知。仰望但云树,俯顾惟妻儿。寝食起居外,端然无所为”。^{[1]588}招萧处士他描述自己的忠州生活境况是“老去襟怀常濩落,病来须鬓转苍浪。心灰不及炉中火,鬓雪多于砌下霜”^{[1]1182}冬之夜。“山上巴子城,山下巴江水。中有穷独人,强名为刺史。时时窃自哂,刺史岂如是?仓粟馁家人,黄缣裹妻子。莓苔翳冠带,雾雨霾楼雉”^{[1]587}南宾郡斋即事寄杨万州。愁思、寂寥是此期诗中最常出现的词语:

莫辞数数醉东楼,除醉无因破得愁。唯有绿樽红烛下,暂时不似在忠州。^{[1]1181}东楼招客夜饮

巴童巫女竹枝歌,懊恼何人怨咽多。暂听遣君犹怅望,长闻教我复如何!^{[1]1164}听竹枝赠李侍御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歌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南病使君。^{[1]1183}竹枝词四首之二

这些诗中反复咏叹万里漂泊的流落之愁,传递其心中深厚的抑郁感伤之情。那么,这种大量存在于白居易元和十四年(819)忠州诗中的乐少愁多的悲情,其背后的原因何在呢?在白居易自身的生活遭际之外,却也不能排除朝廷发生的重要事件对白居易的影响。以下就围绕白居易被任忠州刺史前后的朝政状况、朝廷上所发生的重臣更动等大事件进行分析。

尚永亮先生曾对元和年间的政治形势详细分析,他得出结论说:“元和十四年,可谓中唐乃至整个唐王朝的一个重要界碑。这一年,裴度、崔群两位贤相被挤出朝,韩愈因直言强谏被贬潮州,宪宗专任权奸皇甫镈等。尽管就封建政治而言,这些事件并不算太大,而且此后一年宪宗方被弑身亡,宪宗死后也还有相当一段政局稳定的时间,但从实质上看,此年所发生的事件却透露出了一个极危险的信号,它预示着从此开始,元和之治便已名存实亡了,而唐王朝也很难再有中兴的希望了。”^{[6]299}如上所述,白居易忠州时期大量的感伤诗正是产生在元和十四年这个重要的年份,元和十五年正月宪宗暴崩,其年初夏,白居易也离开忠州返回长安。

白居易从量移的一开始就没有做长久安居于忠州的政治打算,他在元和十三年(818)底接到量移忠州之命时,写了一首《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仰荷圣泽聊书鄙诚》的诗,其中就明确表达了期望早日还朝的心思:“乡觉前程近,心随外事宽。生还应有分,西笑问长安。”^{[1]1127}既然心存如此期盼,那就不会放弃对于朝廷大事件的关注。在量移忠州期间,白居易虽然很少用文字评论时事,但并不能因此说他就不再关心朝廷的重大事件。元和十四年(819)二月,李师道手下都知兵马使刘悟与李师道互相猜忌,“师道潜遣二使赍帖授行营兵马副使张暹,令斩悟首献之,勒暹权领行营。”“暹素与悟善”“暹怀帖走诣悟,屏人示之。悟潜遣人先执二使,杀之”^{[3]7762-7763}。随之,刘悟令士卒入郾,斩杀了李师道及其二子。李师道的覆亡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3]7765}对于李师道的覆灭,白居易于元和十四年(819)四月作《贺平淄青表》,内中称作文缘由是“见二月二十二日制书,逆贼李师道已就梟戮者”,文中表达了自己对“妖氛廓清”“两河清晏,四海会同”的喜悦:“诚欢诚喜”“无任庆快踊跃之至”。^{[1]3425}又,元和十四年(819)七月“己丑,群

臣上尊号曰元和圣文武法天应道皇帝。赦天下”^{[3]7769}。白居易在忠州作《贺上尊号后大赦天下表》，开篇即云：“伏奉七月十三日制书，大赦天下。跪捧宣布，蹈舞欢呼”。^{[1]3426}

然而，尽管白居易关切朝政，且对自己的未来心存期盼，但元和十四年（819）前后朝廷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带给人们振奋的同时，却也留下了诸多令人遗憾之处。除前述任用柳泌和贬谪韩愈事件外，《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唐纪》五十六还记载了宪宗皇帝的“骄侈”：“淮西既平，上浸骄侈。”^{[3]7752}元和十三年（818）正月，“上命六军修麟德殿；右龙武统军张奉国、大将军李文悦以外寇初平，营缮太多，白宰相，冀有论谏。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二月，丁卯，以奉国为鸿臚卿，壬申，以文悦为右武卫大将军，充威远营使。于是浚龙首池，起承晖殿，土木浸兴矣”^{[3]7748}。元和十四年（819）七月“戊寅，宣武节度使韩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献马三千，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器千。”“甲午，韩弘又献绢二十五万匹，缯三万匹，银器二百七十；左右军中尉各献钱万缗。自淮西用兵以来，度支、盐铁及四方争进奉，谓之‘助军’；贼平又进奉，谓之‘贺礼’；后又进奉，谓之‘助赏’；上加尊号又进奉，亦谓之‘贺礼’。”^{[3]7770}。宪宗的“骄侈”导致了邀宠者的上位，皇甫镈、程异就是因为“数进羨馀，由是有宠”^{[3]7752}。此事将在下文专门论及，此处暂时略过，先来看看发生在元和十四年（819）的被司马光严厉批评的宪宗朝廷“不敦大信”的事件。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一《唐纪》五十七中这样评论宪宗：“惜夫！宪宗削平僭乱，几致升平，其美业所以不终，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3]7773}司马光所说的“不敦大信”是针对发生在元和十四年（819）七月的王弁作乱杀死兖海沂密观察使王遂，以及朝廷因之而诱杀郛人的事件而发。

元和十四年（819）二月平定李师道之后，“上命杨於陵分李师道地，於陵按图籍，视土地远近，计士马众寡，校仓库虚实，分为三道，使之适均：以郛、曹、濮为一道，淄、青、齐、登、莱为一道，兖、海、沂、密为一道；上从之”^{[3]7765}。据《资治通鉴》记载，“兖、海、沂、密观察使王遂，本钱谷吏，性狷急，无远识。时军府草创，人情未安，遂专以严酷为治，所用杖绝大于常行者；每置将卒，辄曰‘反虏’；又盛夏役士卒营府舍，督责峻急；将卒愤怒。”^{[3]7770}。在这种情况下，七月，役卒王弁等五人密谋作乱，杀死王遂和副使张敦实。王弁“自称留后，升厅号令，与监军抗礼，召集将吏参贺，众莫敢不从”^{[3]7770}。朝廷遂命棣州刺史曹华为沂、海、兖、密观察使，引棣州兵赴镇平乱。《资治通鉴》记载其过程曰：

朝廷议兴兵讨王弁，恐青、郛相扇继变，乃除（王）弁开州刺史，遣中使赐以告身。中使绐之曰：“开州计已有人迎侯道路，留后宜速发。”弁即日发沂州，导从尚百余人，入徐州境，所在减之，其众亦稍逃散。遂加以柎械，乘驴入关。九月，戊寅，腰斩东市。^{[3]7772}

先是，三分郛兵以隶三镇，及王遂死，朝廷以为师道余党凶态未除，命曹华引棣州兵赴镇以讨之。沂州将士迎侯者，华皆以好言抚之，使先入城，慰安其余，众皆不疑。华视事三日，大飧将士，伏甲士千人于幕下，乃集众而谕之曰：“天子以郛人有迁徙之劳，特加优给，宜令郛人处左，沂人处右。”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阖门，谓郛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为帅于此，将士何得辄害之！”语未毕，伏者出，围而杀之，死者千二百人，无一得脱者。^{[3]7772}

宪宗朝廷用诱讨的方式平定叛乱，司马光对这种行为坚决反对，他在《资治通鉴》中留下了这样尖锐明确的批评文字：

臣光曰：《春秋》书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于申。彼列国也，孔子犹深贬之，恶其诱讨也，况为天子而诱匹夫乎！

王遂以聚敛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乱。王弁庸夫，乘衅窃发，苟沂帅得人，戮之易于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诏书为诱人之饵乎！且作乱者五人耳，乃使曹华设诈，屠千余人，不亦滥乎！然则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将帅，将帅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盼盼，如寇讎聚处，得间则更相鱼

肉,惟先发者为雄耳,祸乱何时而弭哉!^{[3]7772-7773}

司马光分析这次事变的主因在于王遂苛虐、王弁乘衅窃发,虽然事变很快得到处理,但司马光对于宪宗朝廷“以天子诏书为诱人之饵”“作乱者五人耳,乃使曹华设诈,屠千余人”的解决方式大不以为然,他批评“诱”“诈”终将造成上下相猜、祸乱相连的局面,更进一步把宪宗升平美业不得其终的缘由归因于“苟徇近功而不敦大信”。

下面再来看宪宗晚年信用非人,导致皇甫镈、程异上位,宰相裴度、崔群被逐出朝廷的事件。

《新唐书·宪宗纪赞》对唐宪宗有这样的评价:“宪宗刚明果断,自初即位,慨然发愤,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自吴元济诛,强藩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则其为优劣,不待较而可知也。及其晚节,信用非人,不终其业,而身罹不测之祸,则尤甚于德宗。呜呼!小人之能败国也,不必愚君暗主,虽聪明圣智,苟有惑焉,未有不为患者也。”^{[7]219}这段话包含二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赞宪宗“志平僭叛”“卒收成功”,使“唐之威令,几于复振”的历史功绩;二是憾“其晚节,信用非人,不终其业”。对于前者,即平定强藩悍将,维护并加强朝廷的权威,改变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的状况,其历史功绩有目共睹。诚如尚永亮先生所说:“元和群臣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中,基本解决了自安史乱后即已存在而至德宗末年尤为严重的藩镇割据问题,完成了永贞朝想完成却无力完成的任务,使得元和之治在实际上得以实现。”^[8]至于后者,即“信用非人,不终其业”,这里仍以《资治通鉴》记载为据,以重臣裴度、崔群、皇甫镈、程异的出入朝廷为例加以说明。

元和十三年(818)八月,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工部侍郎程异并同平章事。《旧唐书·皇甫镈传》记载淮西平定后,“时宪宗以世道渐平,欲肆意娱乐,池台馆宇,稍增崇饰,而(程)异、(皇甫)镈探知上旨,数贡羨余,以备经构,故帝独排物议相之”^{[2]3741}。皇甫镈、程异二人之中,程异死于元和十四年(819)三月,在相位时间很短。《旧唐书·程异传》记载程异入相,“议者以异起钱谷吏,一旦位冠百僚,人情大为不可。异自知叨据,以谦逊自牧,月余日,不敢知印秉笔。异知西北边军政不理,建议置巡边使,上问谁可使者,异请自行。议未决,无疾而卒”^{[2]3738}。《资治通鉴》也说“程异亦自知不合众心,能廉谨谦逊,为相月余,不敢知印秉笔,故终免于祸”^{[3]7753}。从历史记载来看,元和十四年(819)朝廷中排挤裴度、崔群的斗争,其关键的人物是皇甫镈,而宪宗自始至终都是站在皇甫镈一方的。

元和十三年(818)八月,皇甫镈、程异被任命为宰相,“诏书既下,物情骇异,至于贾贩无识,亦相嗤诮。宰相崔群、裴度以物议上闻,宪宗怒而不听”^{[2]3739}。“度耻与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许”^{[3]7752}。于是裴度再上疏,矛头直指皇甫镈,其言辞十分激烈:

皇甫镈自掌财赋,唯事割剥,以苛为察,以刻为明。自京北、京西城镇及百司并远近州府,应是仰给度支之处,无不苦口切齿,愿食其肉;犹赖臣等每加劝诫,或为奏论,庶事之中,抑令通济。比者淮西诸军粮料,所破五成钱,其实只与一成、两成,士卒怨怒,皆欲离叛。臣到行营,方且慰喻,直其迁延不进,供军渐难,俱能前行,必有优赏,以此约定,然后切勒供军官,且支九月一日两成已上钱,俱容努力,方将小安,不然必有溃散。今旧兵悉向淄青讨伐,忽闻此人入相,则必相与惊忧,以为更有前时之事,则无告诉之忧。虽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罢兵之后,经费钱数一千三十万贯,此事犹可。直以性惟狡诈,言不诚实,朝三暮四,天下共知,惟能上惑圣聪,足见奸邪之极。程异虽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处之烦剧,或亦得力,但升之相位,便在公卿之上,实亦非宜。如皇甫镈,天下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为股肱,列在台鼎,切恐不可,伏惟图之。倘陛下纳臣恳款,速赐移易,以副天下之望,则天下幸甚……今者臣若不退,天下之人谓臣有负恩宠;今退既未许,言又不听,如火烧心,若箭攒体。臣自无足惜,惜陛下今日事势。何者?淮西荡定,河北咸宁,承宗斂手削地,程权束身赴阙,韩弘舆疾讨贼,此岂京师气力能制

其命,只是朝廷处置能服其心。今既开中兴,再造区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使亿万之众离心,四方诸侯解体?凡百君子,皆欲恸哭。^{[2]3740-3741}

裴度的上疏并未能改变宪宗的主张,相反,“上以度为朋党,不之省”^{[3]7753},且云:“人臣当力为善,何乃好立朋党!朕甚恶之。”^{[3]7756}结合其后裴度、崔群被皇甫镈挤出朝廷的事实来看,宪宗在任相上的态度已经相当明确。

《旧唐书·皇甫镈传》说“镈虽有吏才,素无公望,特以聚敛媚上,刻削希恩”^{[2]3739}。通过《资治通鉴》对于皇甫镈入相后的言行记载可以窥看其品性:

镈自知不为众所与,益为巧谄以自固。^{[3]7753}

时内出积年缁帛付度支令卖,镈悉以高价买之,以给边军。其缁帛朽败,随手破裂,边军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镈于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内库所出,臣以钱二千买之,坚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为然。由是镈益无所惮。^{[3]7753}

皇甫镈专以掊克取媚,人无敢言者。^{[3]7768}

皇甫镈巧谄且肆意,得到宪宗的信任后,其矛头很快就对准了裴度和崔群。《旧唐书·裴度传》称“度执性不回,忠于事上,时政或有所阙,靡不极言之,故为奸臣皇甫镈所构”^{[2]4421}。《旧唐书·皇甫镈传》说“裴度有用兵伐叛之功,镈心嫉之”^{[2]3741}。《资治通鉴》记载:“裴度在相位,知无不言,皇甫镈之党阴挤之。丙子,诏度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3]7768}皇甫镈于元和十三年(818)八月任相,元和十四年(819)三月就发生了裴度充河东节度使的事,其手段之狠辣可想而知。

崔群的情况也是如此。《旧唐书·崔群传》记载:“度支使皇甫镈阴结权倖,以求宰相,群累疏其奸邪。”^{[2]4189}《旧唐书·皇甫镈传》记载:“崔群有公望,为搢绅所重,屡言时政之弊,镈恶之。”^{[2]3741}崔群屡言皇甫镈奸邪,二人公开对立。《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一记载了元和十四年(819)七月宪宗与崔群关于朝廷上用人得失与国家理乱关系的一段对话:

上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曰:“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乃社稷无疆之福!”皇甫镈深恨之。^{[3]7773}

崔群列举唐玄宗前后用人与国家安危之间的直接关联,期盼宪宗皇帝“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却招到皇甫镈的“深恨”,正说明皇甫镈是读懂了崔群的话中之话。几个月后的元和十四年(819)十二月,崔群被逐出朝廷,去作湖南观察使。《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一《唐纪》五十七记载其原委曰:

初,群臣议上尊号,皇甫镈欲增“孝德”字,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群曰:“言圣则孝在其中矣。”镈谮群于上曰:“群于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时镈给边军赐与,多不时得,又所给多陈败,不可服用,军士怨怒,流言欲为乱。李光颜忧惧,欲自杀;遣人诉于上,上不信。京师汹惧,群具以中外人情上闻。镈密言于上曰:“边赐皆如旧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群鼓扇,将以卖直,归怨于上也。”上以为然。十二月,乙卯,以群为湖南观察使,于是中外切齿于镈矣。^{[3]7775-7776}

从这里记载的崔群被逐的前前后后看,皇甫镈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有意把崔群的所为上升成与宪宗对立,一则曰崔群对于宪宗惜用“孝德”二字,激起“上怒”;二则当军士怨怒、京师汹惧之际,诬崔群鼓扇,“将以卖直,归怨于上”,再一次激化矛盾,最终达到了排斥异己的目的。

洪迈在《容斋续笔》中曾对元和宰相裴度、崔群和皇甫镈之间的关系及斗争进行评论,其言曰:

唐德宗贞元十年,贤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均为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群、皇甫镈

继之。六名之中,连得五相,可谓盛矣!而邪正复不侔。度、群同为元和宰相,而罇以聚敛贿赂亦居之,度、群极陈其不可,度耻其同列,表求自退,两人竟为罇所毁而去。且三相同时登科,不可谓无事分,而玉石杂糅,薰莸同器,若默默充位,则是固宠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贤,谊难以处也。^{[9]376}

洪迈以“贤”评价裴、崔二相,然“两人竟为罇所毁而去”。那么白居易与这两个元和政坛的重要人物关系如何呢?他们的遭遇与白居易忠州时期诗歌的感伤情绪有没有关系呢?

翻检白居易作品集,其中涉及与裴度亲密酬赠的诗歌大量出现在大和三年(829)白居易“称病东归,求为分司官,寻除太子宾客”^{[2]4353}之后。裴度于大和八年(834)充东都留守,《旧唐书》卷一百七十《裴度传》记载曰:“自是,中官用事,衣冠道丧。度以年及悬舆,王纲版荡,不复以出处为意。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又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酤引脉分,映带左右。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2]4432}白居易此期写下了大量的闲适诗,不过这已经是远在忠州刺史之后的事情。白居易忠州时期与裴度基本上没有特别的交集,所以对于白居易来说,裴度元和十四年(819)三月的被排挤出朝,主要还是出于对当时总体政治形势的观察评判,至于个人情感似乎还谈不上。

与裴度相比,崔群与白居易的情谊从年轻时就已开始。二人都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白居易大和二年(828)五十七岁时作有《花前有感兼呈崔相公刘郎中》:“何事同生壬子岁,老于崔相及刘郎”。^{[1]1757}他们又都是在元和二年(807)十一月入为翰林学士,其后一直情谊深厚。元和九年(814)六月,崔群官拜礼部侍郎,当年四十三岁的白居易作有《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回忆当年朝中共事的亲密:“忽忆烟霄路,常陪剑履行。登朝思检束,入阁学趋跄。”“同日升金马,分宵直未央。共词加宠命,合表谢恩光。厩马骄初跨,天厨味始尝。朝晡颁饼饵,寒暑赐衣裳。对秉鹅毛笔,俱含鸡舌香。青缣衾薄絮,朱里幕高张。昼食恒连案,宵眠每并床。差肩承诏旨,连署进封章。起草偏同视,疑文最共详。灭私容点窜,穷理析毫芒。便共输肝胆,何曾异肺肠”。^{[1]874}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江州后,崔群屡致问候。《答户部崔侍郎书》是白居易元和十一年(816)作于江州贬所的作品,内中就提到崔群“首垂问以鄙况”“次垂问以体气”“次垂问以月俸”“又垂问以舍弟”“终垂问以心地”^{[1]2806}。元和十二年(817)七月,崔群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年,白居易作有《答崔侍郎钱舍人书问因继以诗》,专门提及与崔群、钱徽虽迁谪异路,却始终同心相好:“吾有二道友,蔼蔼崔与钱。同飞青云路,独堕黄泥泉。岁暮物万变,故情何不迁!应为平生心,与我同一源。”^{[1]389}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二十日,白居易接到量移忠州之命,此时崔群正在宰相任上,白居易同期所作《除忠州寄谢崔相公》诗中明确表达了对崔群提拔的感激之情:“提拔出泥知力竭,吹嘘生翅见情深”。^{[1]1128}崔群卒于大和六年(832)八月,时年六十一岁的白居易作《祭崔相公文》,其中专门忆及与崔群的忠义互勉,知心笃好:“始愚与公,同入翰林。因官识面,因事知心。献纳合章,对扬联襟。以忠相勉,以义相箴。朝案同食,夜床并衾。绸缪五年,情与时深。”^{[1]3762}同一年白居易还作有《与刘禹锡书》,回首一生友朋,白居易特别提到平生情感最深的四位友朋:“平生相识虽多,深者盖寡,就中与梦得同厚者,深(李绹,字深之)、敦(崔群,字敦诗)、微(元稹,字微之)而已”。^{[1]3940},可见白居易与崔群的友情之深。

从时间节点上看,崔群被逐出朝廷是在元和十四年(819)十二月,这个时间点的前后也正是白居易身在忠州,且大量写作感伤诗的时候。以白居易与崔群之间的亲密关系,崔群在朝中的争斗及最终从相位上被逐,对白居易来说是一个打击。朱金城先生对白居易《闻李尚书拜相因以长句寄贺微之》一诗作笺云:“唐中叶后,亲知在相位,必得其左右,乃常人意中所有之事耳。”^{[1]1096}元和十三年(818)三月,与元

稹友情契合的李夷简入相,白居易就特意作此诗预祝元稹“怜君不久在通川,知己新提造化权。”“肯向泥中抛折剑,不收重铸作龙泉。”同样,挚友崔群被逐,对白居易来说,应该也意味着前途的渺茫和未知,在荒僻的忠州,他自然会徒增感伤抑郁了。

唐宪宗朝廷在元和十四年(819)前后发生的大事件对远处忠州的白居易及其诗歌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正是白居易自身的仕宦遭遇与朝廷的大事件共同作用,塑造了白居易忠州时期的诗歌表达形式及情感方向。

[参 考 文 献]

- [1] 朱金城. 白居易集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2] 刘昉,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 [4] 韩愈. 韩昌黎文集校注[M]. 马其昶,校点. 马茂元,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5] 芳村弘道. 唐代的诗人研究[M]. 秦岚,帅松生,田建国,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6] 尚永亮. 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 [7]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8] 尚永亮. 论元和君权与政治兴衰[J]. 文史哲,1995(4).
- [9] 洪迈. 容斋随笔[M]. 孔凡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5.

The Influence of the Great Court Events in the 14th Year of Yuan He Dynasty on Bai Juyi's Poems in Zhongzhou

Chen Xin

(College of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401331, China)

Abstract: On March 28, the 14th year of Yuanhe reign of emperor Xianzong of Tang Dynasty, Bai Juyi arrived in Zhongzhou. He wrote a large number of poem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his poems are as follows: the poems on political affairs are peaceful and simple, and the works on the theme of personal life are generally permeated with the poetic feelings of sorrow. The appearance of this situ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cause of personal career, also has a lot to do with the great events of the court. It was the great events of the court and Bai Juyi's official experience that shaped his poetic expression and emotional direction.

Keywords: the 14th Year of Yuan He Dynasty; great court events; Bai Juyi's poems in Zhongzhou

[责任编辑:孟西]